

第一章 当代史的本质

——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

当代世界的基本时势几乎完全不同于俾斯麦所处的那个时代。所有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当代的显著特征，即它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格局和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我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当代史导论的原因。本书不是通常那种侧重记叙过去 60 或 70 年来欧洲及其以外地区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导论。因为仅仅记述各种事件的过程，即使这种记述扩及世界范围，也未必能使人很好地理解当今世界，而只有同时考虑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方才能使人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运动。在这里，我的首要任务是探讨当代社会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种新的联系，这些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探讨将涉及某些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倘若他们对导致旧世界解体的各种因素作出了解释，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新的世界何以形成的解释。所以当代史基本上是记述两次世界大战，1919 年的和平协定，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自 1945 年以来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发生的冲突。在我看来，这种线型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把人引入歧途，理由容后细说。在当代史研究中，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新世界的降临，而不是已消逝的旧世界，只

要环顾一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可发现当代世界某些最显著的特征已在远离欧洲的地区所发生的各种运动和发展中显露端倪。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加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务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正是由于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改变了以往的格局，所以它们已超越了传统的线型历史发展过程；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无论是性质还是内容，当代史与众所周知的“现代史”截然不同。从现在的立场出发来回顾一下，我们发现俾斯麦退出政治舞台的 1890 年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的 1961 年之间是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分水岭。分水岭的一边是当代，它仍处在开始阶段，分水岭另一边是源源流长的包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人们所熟悉的三次历史发展高潮的“现代”史。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分割人类历史发展两个不同时代的这个巨大的分水岭，因为塑造当代世界的诸种力量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

—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许多历史学家（也许是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会怀疑我对‘现代’史和‘当代’史所作的区

分的正确性，并会否定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分水岭。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原因很多。首先，正如通常所使用的那样，“当代”一词概念模糊，几乎缺乏明确的涵义。其次，当前，历史编纂存在着强调历史连续性因素的倾向。因为，在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看来，当代史并不以其本身显著的特征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相反，他们把当代史看作是连续不断历史进程中的最近的阶段，颇有保留地承认当代史与早于它的历史具有本质的区别，而根本上只把它作为最接近于我们的“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不想用更多的篇幅来陈述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上述这种看法的理由。^①在我看来，连续性决不是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罗素曾经说过：“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②我对历史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面临各种偶然的、未预见到的、新的、生气勃勃的和革命性的事件；正如巴特费尔德所指出的，处于这样的时代，通常关于历史发展因果联系的理论“已不足于解释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以及各种事件的下一次转折”。^③事实上，当人类走出老路而步入新的康庄大道时，即当人类历史的发展离开了原定的路线而走向新的方向时，确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很困难的。人

①我在我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对此作了简短论述，见此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第 4 页。

②参见罗素：《科学观》(Bertrand Russell, The Scientific Outlook, London, 1931), 第 98 页。

③参见巴特费尔德：《历史和人类关系》(H.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1951), 第 94 页。

类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根本转折时代，如 11 世纪末和 12 世纪初的社会和思想大变动（我们一些历史学家很不恰当地称之为‘主教叙任权之争’），以及众所公认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20 世纪上半叶具有历史性转折时代那种相同的革命性的变革和危机的所有标志。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涉及到历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历史分期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涉及范围很广，所以很难集中讨论它所引起的各种理论问题。但是，倘若我们根据这种历史分期的原则来看待 1890 年左右开始的 50 或 60 年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得出某种重要的结论。首先，不能把 20 世纪仅仅看作是 19 世纪的延续 其次，‘近来的’历史或者‘当代’史不只是通常所谓‘现代’史的后段，就如传统的历史分期，把现代史看作是开始于西欧的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标志的时代的最近的阶段。倘若上述观点正确的话，我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进一步观点，即我们使用的衡量当代史的标准必须有别于衡量早于它的各个时代所使用的那些标准。我们所寻求的有意义的东西不是两个时代的相同点而是它们的不同点，不是它们连续性的因素而是非连续性因素。总之，我们必须把当代史看作是一个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独特的历史发展时代，它具有区别先前时代的自身的各种特征，正如所谓“中世纪史”显然有别于现代史至少大多数历史学家是这样看的一样。

倘若上述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就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研究近来的历史的史学家的一个首要任务应是阐明近来的历史的显著的特征及其范围。当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谨防各种假的范畴（即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的范畴）我们也必须记住，正如被视为‘典型的

中世纪”的各种事物一直延续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样，所有各种事物也都是从一个时代延续到另一个时代；我们也不要去确定发生各种转变的具体日期，因为转变只是总体的和宏观的。但是，这样的看问题的方法依然是正确的，我们只有对新的和不同的东西保持警觉，才会不致于轻易地放过本质性的东西，即新时代的充满活力的动向。只有在心中完全把握了分割两个时代的真正鸿沟时，我们才能够着手建造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

不言而喻，只有当我们明确了“当代”一词的涵义时，我们才能够以上述这种方法来考察当代史。显然，由于内容含糊和界限不明，当代史研究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是，各人对“当代”一词具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我说的当代未必就是你说的当代，反之亦然。一方面，我们仍然可能会遇到曾同俾斯麦交谈过的人，^①另一方面，时光虽过一代，但希特勒俨然已成了像拿破仑和凯撒一样的历史人物。总之，当代一词是灵活多变的，如说（也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史是现在活着的一代人的历史，这个定义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世代是重叠的。而且，如果我们以此来确定当代史，那么我们就只得不断地变化界限和变化内容，以及变化游移不定的主题。在某些人看来，当代史开始于 1945 年，也许可以回溯到 1939 年；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当代史基本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或稍微扩大一些范

^① 参见戈洛·曼，《俾斯麦和我们的时代》，载《国际事务》，第 38 卷（Golo Mann, Bismarck and Our Tim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XXVIII, 1962），第 3 页。

围,是 1914 年到 1945 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而 1945 年以后则属于尚未形成历史的阶段。例如,德国当代史研究所主要是研究国家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以及因国家社会主义引起的反抗运动。^① 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关于编纂当代史各种具体问题的有胆识的论述,但却未见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事件置之一词,这不是偶然忽略,而是有意不写。

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历史编纂,而且涉及到当代史的概念,而自 1918 年以来,关于当代史的概念引起了长期各执一端而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的论争。^② 论者指出,众多关于当代史争论的唯一相同的看法是认为用词的矛盾。在我们采用历史的眼光之前,我们务必对所研究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要使自己‘超然于’物外,不偏不倚地以历史学家批判的眼光来考察历史,这在无论何时都是很难做到的。何况对于就在我们眼鼻子底下的各种事件,又如何可能坚持这些原则呢?必须马上说明的是,我无意加入对这些方法论的问题的讨论。^③ 编纂当代史无

^① 参见 H. 罗特费尔斯,“当代史的任务”,载《当代史季刊》第 1 卷 (H. Rothfels ‘Zeitgeschichteals Aufgabe’,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I, 1953) 第 8 页;B. 朔伊里希在其《当代史导论》(B. Scheurig, Einführung in die Zeitgeschichte, Berlin, 1962) 第 30 至 31 页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② 这些争论可以在《历史》杂志上找到记录,它起初开始于 1922 年 E. 巴克和 A. F. 波拉德之间的论战(见第 7 卷),随后是 R. W. 西顿-沃森要求进行当代史研究的呼吁(第 14 卷),1941 年时又由 G. B. 亨德森重新提起(第 26 卷),而且又由戴维·汤姆森(第 27 卷)、马克斯·贝洛夫(第 30 卷)以及 F. W. 皮克(第 31 卷)作出进一步贡献。

^③ 这些问题由 H. 罗特费尔斯进行过简略的回顾,见其《当代史研究》(H. Rothfels, Zei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Göttingen, 1959),第 12 页及以后各页。

论会有什么问题,事实是,正如塞顿-沃森很久前曾指出的,自修昔底德时代以来,大多数最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① 确实,如果有人指出,如一些历史学家有时所说的,当代史观念是 1918 年之后提出来的一种迎合觉醒的大众急于了解‘以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错误的需要的时新看法,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这种时新看法并不是一种与现在密切相关的历史概念,而是一种与过去紧密联系的 19 世纪的历史观点。换句话说,这种时新看法是一种当时代的产物,即一个特定时代同一环境的产物,而不加区别地认为所有的当代各种事件或产物都属于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而这种看法却是一种出于“为了了解过去”^② 而对过去进行客观和科学研究的历史观念。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代史因缺乏科学性而不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事实上他们这种看法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而我们武断地加以否定也是没有道理的。现今大多数的所谓当代史,无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苏联人写的,或是英美人写的,通常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反映了热衷于从各个方面打‘冷战’的宣传物或‘时事’漫谈。这种著作所包含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如果我们把古巴的卡斯特罗的革命仅仅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表现,既不把它与不发达世界其他地区相类似的运动联

① 《历史》(History, XIV, 1929)第 14 卷,第 4 页。

② 这点在弗里茨·恩斯特的精采文章“当代大事与历史编纂”中以极大的气韵和学识表现出来,见该文,载《世界史》第 17 卷(Fritz Ernst, ‘Zeitgeschehen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Welt als Geschichte, Vol. XV II, 1957),第 137 至 189 页。

系起来加以考察,也不考虑 1901 年以来长期纠缠的美国和古巴关系史,那么对这场革命的真正评价会是怎样呢?显然,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如果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而这种深度分析丝毫不亚于(甚至于要超过)任何非当代史的研究。我们认识在当今世界起实际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唯一希望是严格从历史出发来加以探求。遗憾的是,这样做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例如,当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时事分析家把这场战争仅仅看作是第二次大战后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一系列冲突对抗中的一个事件,但是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实际上就是为了占据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未见有分析家片言只字的论述。^①无须多说,正确的评价必须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在对近来的历史的分析中,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更深的历史趋向“在解释人们的活动和各种事件中通常所具有的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通常构成当代史编纂主题的共产党统治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②那么我们便无法看得深,吃得透。

归根到底,如果当代史旨在阐明塑造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的变化,那么它只能证实它是一门严谨的学科,

^① 关于 1864 年以后朝鲜问题的简短概述,参见李英桑:《朝鲜与强权政治》(Lee Insang, *La Corée et la politique des puissances*. Geneva, 1959)。

^② 参见郭斌佳:《中国新时代与新观点》(Ping-chia Kuo, *China, New Age and New Outlook*, 2nd ed. . Penguin Books, 1960), 第 9 页。

而不是当代景象浮光掠影的考察。这些变化之所以是根本的,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政治行为赖以发生的骨架或框架。举其要者,这些变化是欧洲的世界地位的改变,美苏“超级大国”的兴起,英国、法国和荷兰老牌帝国主义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觉醒,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战略革命或热核革命。对于这些变化,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各自对这些事件意义的评价。但是,意识到这些事件构成了当代史区别于先前时代的显著特征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客观的趋势却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它们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各个部分,倘若脱离了历史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

在这一方面,当代史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各种历史的研究并无任何不同。而在其他方面,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历史因果联系方法或发生论方法(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下,这一方法已成为历史编纂的传统方法)就不是一种适合于作为研究当代史的工具,而当代史学家则谋求确定当代史的特性,并确立当代史有别于先前时代历史的准则。对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论证历史女神的长袍是无缝的天衣,而是辨别所编织的各种不同的图案。下面我将简单举例来说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区别。

传统方法研究历史是从历史的特定时刻着手的,这种特定时刻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815年协定,并有条不紊地铺叙自那时以来依次发生的事件,以勾勒历史连续性发展的过程。当代史则遵循或应遵循与此几乎截

然相反的研究程序。这两种方法都会使我们追溯过去,但这种对过去的关注将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如关于近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他关注的更多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区别,而不是通常以哈格里夫的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敦的缪尔纺纱机(或称骡机)、瓦特的蒸汽机、卡特赖特的水力织布机为开端的工业革命过程的逐步发展。在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看来,后者要比连接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不可否认的连续性因素更有意义。^①在国际政治史领域中,这种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如果一位历史学家从 1815 年的形势出发并依次铺叙那时以来的史事,那么他总是围绕着欧洲的事件打转,因为 1815 年协定所直接引起的问题主要是欧洲的问题。因此,对他来说,主要问题将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所谓‘东方问题’,民族主义的冲击,尤其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以及泛斯拉夫主义(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矛盾冲突在 1914 年的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点),除了可能在‘欧洲扩张’标题下论及的事件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件往往都被视为边缘事件,它们均自鄙以下,可置勿论。与上述研究方法相反,站在现在立场上的历史学家,对同一时期的历史的关注将与那位以 1815 年协定为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不同。他的出发点将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全球体系,他主要关注的将是解释这种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因此,他既要关注俄勒冈和黑龙江,也同样关注黑塞哥维那和莱茵河,既要重视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同

^①我将在以后论述中回到这方面;参见下文,第 37 页。

样重视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对于帝国主义的种种冲突，无论是在中亚和西太平洋，还是在巴尔干半岛，或是在非洲，他都将置于其视野之内。上述两位历史学家虽然都考察同一段时间的历史，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却迥然不同。

尽管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各种不同的事物，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探索和眼光就一定要比其他历史学家来得肤浅和短浅。例如，由于要正确理解从欧洲中心到世界范围的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就要追溯到被称之为“近代第一次世界冲突”^①的七年战争。又如，当苏联 1945 年占领柏林被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斯拉夫人西进时，难道我们非得要追忆俄国早已在 1760 年占领过柏林的史实吗？显然，这一史实不是当代史，正如苏沃洛夫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率军在意大利和瑞士征战也不是当代史一样。但话说回来，倘若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近来的各种事件，认识和考虑到这些历史事件乃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美国越过美洲大陆向太平洋扩张的史实，是我们认识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样，要认识俄国在亚洲的地位，我们就必须追溯 16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率军对西伯利亚的远征，以及 1649 年以俄国探险者和冒险家为先导的越过亚洲向太平洋海岸的急剧扩张，尽管这种追溯是简短的，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再如，想要认识今日美国的政策，除了

^① 参见比米斯：《美国革命的外交》（S. F. Bemis,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nd ed. . . Bloomington, 1957），第 5 页。

回顾 19 世纪 90 年代和美菲战争、美西战争^①外,不去了解美帝国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这显然是幼稚可笑的。^②

上述这些例子足以表明:当代史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有时所蔑视的那样,意味着仅仅是对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肤浅的探讨,以及根据时下思想观念来加以曲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例子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不把 1898 年、1917 年、1939 年、1945 年或任何其他特定日期作为当代史“开端”的原因。能说明当代史不是现代史的延续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史料是大量的,通过这些众多的史料我们不难得出紧接着 1890 前后的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我们务必谨防注明确切日期。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初次显露之时,也就是当代史的开端之日;当代史是随着变化而开始的,但这种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而是使我们或迫使我们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那种变化。这种变化,正如我已指出的,也是一些历史学家以 15 和 16 世纪之交来划分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界线时所强调的那种变化。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腓特烈二世的意大利一样,当代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但这并不影响或削弱我们对两个时代所

① 19 世纪末美国夺取西班牙殖民地的战争。1898 年 4 月,美国借口美舰在古巴哈瓦那港被炸沉,向西班牙宣战,7 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 月签订《巴黎和约》,美国夺取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古巴形式上宣布独立,实则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译者注

② 参见 R. W. 范·阿尔斯汀尼:《崛起的美帝国》(R. W. van Alstyne, *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 Oxford, 1960)。

作的区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完全为另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取代之前，具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事实上，我们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这种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当代”和“现代”是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似乎只能描绘进入世界新时代的这种转变，而不能描画出这一新时代的完整图景。

二

正如我相信我们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把当代史的概念与新时代的开始联系起来，那么我们该给它起个什么名称呢？回答是：目前明智之举是应避免起名称。诚然，“当代史”一词是暂时性的，而且涵义模糊，但却不带感情色彩。目前，当我们着手从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中来描绘这一新时代的景象时，更为妥当的做法是，与其采用一个明确但不准确的名称，还不如坚持使用当代史这一不带感情色彩的名词，即使它是无意义的。只有当我们对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兴力量有了明确认识时，才是给当今时代起一个更符合其实际的名称的时候。

确实，虽然历史学家为寻求一个新的方案已作了多种尝试，但没有一种方案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有一些历史学家已认识到，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传统的三分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尤其是有人提出，正如地中海时代已为欧洲时代所取代一样，欧洲时代已为

或正在为大西洋时代所取代。^①这种意在把大西洋共同体的形成作为当代史主题的方案表面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并且很吸引人,但是在赞同这个方案之前,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对它怀疑的理由 首先,这个方案与其说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并不是对时下局势的总结,而是对 1941 年大西洋宪章的预测。其次,“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这样的历史发展次序与其所要取代的‘古代——中世纪——现代’历史发展次序,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把当代的历史称为大西洋时代是令人怀疑的,这是因为当代历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欧洲优势的衰弱和欧洲以外地区地位的上升。第三,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来否认联结大西洋两岸各国是“相互依存的部分”的‘历史性的大西洋经济’的存在,但我们显然没有理由怀疑,近来这一经济共同体的趋势是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②

深入的研究表明,1785 年至 1825 年这一时期,西欧和美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自那时以后至 1860 年,这种联系便慢慢地松弛下来,而自 1860 年以后,这种松弛日益加快。^③今天,除了大西洋联盟之外,大西洋两岸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的距离远远甚于一个世纪之前;

① 参见海尔基:《欧洲史的范围和分期》(O. Halecki, *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1950), 第 29、54、60、167 页。

② 这是戈代绍和帕尔默对整个问题进行重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见其《18 至 20 世纪的大西洋问题》(*Le Probleme de l'Atlantique du XVI I le au XXe Siècle* . Printed in Vol. V of the *Relazioni of the Tenth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Florence, 1955), 第 173—239 页。

③ 《18 至 20 世纪的大西洋问题》,前引书,第 199 页。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明确而重要的是，“19 世纪 90 年代”是大西洋经济史中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①

因此，对注重史实的历史学家来说，从当代史的整体图景来看，他们所认为的当代史就是新的“大西洋”时代兴起的历史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合理的根据。的确，与提出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如果我们根据 1949 年以来事态的发展来立论，那么我们可以同样容易和有理由认为，当今世界不是进入了大西洋时代而是进入了太平洋时代。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老挝问题（自 1945 年以来，这些问题比在欧洲所发生的问题会更接近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未获得解决的台湾问题，印度尼西亚与荷兰之间以及印度尼西亚与英国之间在东南亚的紧张关系，更不要说 1949 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可以认为，正如 18 世纪的哲学家认为那时世界史的轴心是从东方转向西方一样，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难道不都证明了世界史的轴心已越过西方转向东方而正好完成了一次循环吗？但是，这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虽然有时令人心醉神往，但还是把它搁置一边为好。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尚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决定这种问题。我们所说‘当代’或‘后现代’的这个新时代正处在它的开端，因此我们尚不能说明它的轴心最终将位于何处。所有我们所冠以名称的时代都是以往的时代；一个时代的特征只

^① 这是布林利·托马斯的结论，见其《移民与经济增长：大英帝国与大西洋经济的研究》（Brinley Thomas,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1954），第 118 页、235 页。并参见戈代绍和帕尔默，前引书，第 235 页。

有从局外对它进行回顾才能加以认识。我们现在只能冠以我们所处的“后现代”一个暂时名称，其原因就在于此。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置身局外并从局外进行回顾，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仍称之为“现代史”的这个时代——潘尼卡认为欧洲时代开始于 1498 年，结束于 1947 年^①——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发展过程；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对现代史的结构和特征具有明确的认识，所以通过对照和比较，我们至少能够得出现代史之后那个时代某种与之不同的特征。

三

的确，我们没有划分当代史与现代史的确切界线。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与那些坚持历史的连续性理论的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同。新世界是在旧世界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在 19 世纪末，当我们初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在旧世界的母腹中断断续续地躁动；自 1918 年以后，新世界获得了独立的身份和它自身的存在；1945 年以后，新世界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只是在不久前，即自 1955 年前后起，它才摆脱了旧世界的束缚，走上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道路。所以，新世界的历史仅仅是其所涉及时代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一小段而已，这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一个复杂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起源，以及它区别于 19 世纪欧洲中心论时代的组成因素，如果我们认

^① 参见潘尼卡：《亚洲与西方的统治》（K. M. Panni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1953），第 11 页。

为这就是我们最为关注问题的部分，那也并没有什么错。

当我们致力于分辨通往未来的这个时代历史的那些线索时，无论选择哪一条我们探讨的特殊线索，事实很快证明那些线索都是以其惊人的规律性集中于大致相近的年代。正是在这一年代，即 1890 年前后，大多数区别‘当代’史与‘现代’史的各种进展初露端倪，如果我们夸大这一年代或任何其他年代的意义而把它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无疑是非明智之举。它只是与统计曲线图中的线条相似，表明了具有一定波动幅度的平均数值。即使如此，它也有相当的客观根据而不容忽视。在 19 世纪终结之前，事实上，各种新的力量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全球的各个地区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倘若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这种变化是相当显著的，许多人都意识到表达事物的方式正在转变。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持‘世界英国化’观点的英国记者斯蒂德，美国史学家亚当斯，甚至为维多利亚女皇统治 60 周年纪念而作的忧郁的《赞美诗》的英国作家吉卜林，是一大批意识到新的力量产生变动影响的人当中几个杰出人物。他们对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作出的特别预言，以及所怀有的恐惧和希望，也许都已被证明是杞人忧天或是错误的，但他们的这种对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感觉却不只是一种幻觉，尽管这种感觉通常是朦胧的，但有时却是敏锐的。

当我们致力于认识使世界转入新的趋向的各种力量时，我们可以看到突出的因素是 19 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以及与此具有密切联系的‘新帝国主义’。于这些近年来引起激烈争论的互相关联的运动的性质和